

历代变法成败谈

□ 路向军

中国历朝历代，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文化习俗，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改革中，大的变法改革就有子产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新政、永贞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等，其经验教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变法的时机

商鞅变法时秦国长期内乱，兵弱主卑、贫穷落后，渴望变法图强。王莽新政，更处于西汉末期政治“有七亡而无一得”、人民境况“有七死而无一生”、朝野上下都渴望变革的大好时机。这种情况的变法改革宏观上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时机的把握，是决定变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改革的时机而论，最为超前的是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取得了罕有的成功，就在于他能把握时机、创造改革环境。子产执政之初（公元前543年），先进行作为国家基石的田地制度的整顿，改变土地不均的状况；待田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得到国民拥护后，执政的第五年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待军制改革增强了国防力量，执政的第七年再进行法制改革，“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在法制史和社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变法的政治权力基础

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改革，政治权力基础至关重要。

战国时期有两次成功的变法，一次是魏文侯－李悝变法，魏文侯28岁即位，在位50年；另一次是秦孝公－商鞅变法，秦孝公20岁即位，在位25年。两位君主年富力强，长期掌握大权，给予变法强有力的支持。

与这两次改革不同，缺乏政治

权力基础，特别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永贞改革、庆历新政、戊戌变法等改革的致命缺陷。永贞改革和戊戌变法有不少共同之处。第一，前者依靠的是一个在位只有几个月、还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的皇帝唐顺宗；后者依靠的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第二，改革集团都是一群地位不高的新人，前者的核心人物王叔文是翰林学士，王还是翰林待诏，柳宗元、刘禹锡是员外郎，有笔无剑，主持改革被讽为“秘书干政”；后者核心人物康有为是个无权觐见皇帝的工部主事，梁启超是个没有官职的举人，地位最高的谭嗣同也只是个四品军机章京，起草谕旨文书而已。第三，反对势力过于强大，永贞时宦官和藩镇已长期把持国家权力，盘根错节；戊戌时朝廷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掌管中枢机关和地方实权官员大多是反对维新的守旧派。

在这种极为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保守势力一反扑，革新势力顷刻瓦解：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宦官和藩镇迫使顺宗立敌视改革集团的李淳为太子，八月又迫使顺宗“禅位”给李淳（唐宪宗），改革集团人物俱被清算放逐；与此类似，戊戌年9月慈禧得到维新派密谋逼宫的密报，立刻软禁光绪，再次垂帘听政，下令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

永贞王叔文集团掌权只有146天；戊戌变法自6月11日光绪颁“明定国是”诏书到慈禧废止新政，仅维持了103天。

变法内容是否利国利民

子产改革，以“为田洫”为先行，厘清土地所有权，收回大贵族违制占有的土地进行再分配，承认新兴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征收税赋

以增强国防等。一开始遭到国人反对甚至仇视，传说说“取我衣冠而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三年之后，土地不均的情况得到纠正，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国家也富强起来。国人转而拥护子产的改革，传说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改革军赋制度，让“野人”即被征服地区人民与国人同样纳税服役；“铸刑鼎”将法律公布于众，改变“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实行“学而后进入政、择能而使之”的用人制度，这些改革起初也招致许多人反对，但由于这些改革确实利国利民，很快就得到了国人的拥戴。

与之相反，以搜刮民财为目的的改革必然招致失败。在王莽新政的16年中（公元7—23年），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每一次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如第一次，诏令在当时流通的五铢钱之外，增发三种货币：“大泉”“契刀”“错刀”。“大泉”重十二铢，值五十枚五铢钱，是20多倍的不等价交换，“契刀”值五百，“错刀”值五千，更是上百倍的不等价交换，用政治权力赤裸裸地掠夺人民财产。王莽这些倒行逆施的“新政”，激起各阶层的强烈反对，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

变法的策略

成功实施改革的子产、魏文侯、李悝、张居正等，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

子产20岁率家兵平定郑国内乱后即参与国政，29岁为卿，40岁担任国卿（首相），深知使郑国由衰而兴的关键所在。郑国是夹在晋楚两强之间的弱国，子产采取“从晋和楚”的策略，争取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为田洫”“为丘赋”，发展经济增强国防；再顺次进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认真抓好本地区本行业本系统请示报告工作。请示报告，不仅涉及下情上报的纪律要求，还涉及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不仅涉及党内上下级党组织关系，还涉及党对同级其他组织的领导。因此，各级党组织在自身履行请示报告职责的同时，要抓好本地区本行业本系统请示报告工作。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责任，关系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否严明，关系政治生态是否健康，关系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地方各级党委要统筹抓好本地区的请示报告工作；中央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中央各部门、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党组（党委）应当对本领域、行业、系统内请示报告的具体事项提出明确要求、加强工作指

行法制、军制、用人制度等改革，使郑国得以变强。

张居正隆庆六年（1572年）成为首辅前已有25年从政经历，先后掌管国子监、翰林院、吏部，掌握了一批军政人才。他成为首辅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他首先争取到李太后和“内相”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支持，得以主持和裁决军政大事十年，有了推行改革的政治权力基础和时间。他在财政上清丈田地，推行总括赋役的“一条鞭法”，使得国库充盈；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考核各级官吏，政体为之肃然。

与之相比，永贞和戊戌的改革集团，则都是缺乏政治历练，甚至没有从政经验的书生。永贞改革集团的王叔文、王伾担心病入膏肓的顺宗不久于世，不顾积弊深重的政治现实，企图一日尽除宦官藩镇弄权的弊政，又不善妥协，终使永贞改革流星般坠毁。

甲午战争后，朝野很多人都认识到旧法的不足和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呼吁变法。但戊戌维新集团急于求成，在变法的103天中，光绪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其中八九月之交的17天内，竟下达了132件谕旨，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不具有可操作性，也几乎都得不到执行。改革内容上要尽采西法，将传统的东西都视为落后一概摒弃，大量裁减官吏，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废除科举……甚至要搞“中美英日合邦”，请外国人来华执政和变法。不仅守旧派反对，连许多支持变法的人士也不赞成。



各级党组织要将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情况作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内容，对下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同志进行考核评价；对未按规定进行请示报告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追究责任。各级党组织要对请示报告内容的真实性把关负责，每一级都要负起每一级的责任，决不能敷衍了事，未经核查就转手上报。各级党组织要如实反映情况、分析问题、提出建议，既报喜又报忧、既报功又报过、既报结果又报过程，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华而不实、欺上瞒下。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行请示报告职责，按规定按程序向组织请示报告工作中重大问题和个人有关事项，决不能随心所欲、百无禁忌，更不能明知故犯、肆无忌惮。

中国自古以来即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自夏商周以来，通过授民授疆土和东周东迁，中国实现了北方地区从渭水流域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西部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土开发，并孕育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实现了最早的民族发育，建立了统一的秦汉帝国。之后，伴随着多次民族大融合和北人南迁，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南北方的交流不断加强，国土开发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隋唐以后的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历史表明，自西周分封诸侯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历汉唐宋元明清诸朝，多民族大一统的格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脉，中国的统一时间之长无与伦比，为世界所仅见。

开疆拓土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开启了清代统一的历史进程。面对着激烈而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清朝统治者通过血与火的残酷战争，在顺治年间相继平定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等，在康熙初年基本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格局。清朝统治者与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和外侵之敌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从平三藩、收台湾到抗击沙俄入侵，从粉碎罗卜藏丹津叛乱到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从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到收复新疆伊犁，在极为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组织了一次次规模浩大的军事远征，或长途跋涉，冒雪冲寒，或冲踏流沙，横越绝漠，其路途之远，山川之险，补给之难，军行之艰，难以想见、令人惊叹。

历经百余年的开疆拓土和顺康雍乾诸朝的苦心经营，至乾隆年间实现了大一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励精图治

为实现和巩固全国统一，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建立了更加有效的统一制度。通过设立军机处，实现了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大大提高了处急应变效率和解决重大机要事务的能力。通过密折奏报制度，使督抚、藩臬、驻防将军等封疆大吏相互监督 and 纠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八旗兵重点驻防与绿营兵广布遍置相结合的军事制度，成千上万的驿站和递铺彼此相连、四通八达，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的严密而快速的军事系统。在财政上严格实行奏销审计制度，削弱了地方财权，使财权更集中地归于中央。通过这些措施，清朝彻底根除了历代王朝曾出现的宰相擅权、母后专政、外戚篡夺、宦官横行、地方割据等危害皇权的隐患，使国家的统一达到了传统社会的较高水平。

在治理和巩固边疆上，清朝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复出现，边疆地区的民族对抗和战争史不绝书。秦汉之匈奴，南北朝之匈奴、鲜卑、羯、氏、羌，唐之突厥、回纥、吐蕃，宋之契丹、党项，明之蒙古、女真，都与中原王朝发生过多次和大规模的政治对抗和残酷战争。

面对疆域不断扩大、边疆和民族问题更为复杂的新情况，清朝统治者

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统一

——清王朝的兴衰史鉴（二）



在“首崇满洲”的同时，突破华夷之防，采取各种办法协调民族关系，不仅稳定和巩固了边疆，更使边疆的少数民族成为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清朝统治者根据各个地区、民族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边疆实施有针对性的统治和管理。在政治和管理体制上，或立将军、或定盟旗、或依伯克、或驻大臣、或改郡县。建立“年班”“围班”制度，密切与边疆民族首领和上层贵族的联系。在经济上，鼓励屯垦，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特别是在十八、十九世纪，清朝的移民实边政策不断推进，大量的中原人口流向边疆，边疆人口急剧增加，不仅促进了边疆开发，实现了生产方式由以畜牧业为主向农、牧、工、商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巨大转变，而且使东西部的联系更加密切，东西部的差距不断缩小。在军事上，设官驻兵，筑城设守，兴修驿路，多置驿站，广设卡伦，大大加强了边疆的军事力量和内地与边疆的联系。面对清朝晚期的外敌入侵和边疆危机，清朝又在故土新归的新疆、孤悬海外的台湾、满族发源的东北先后建立行省。这些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使广袤的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内地联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奠定了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地位，在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上实现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

（上接1版头条）
提高政治能力，就是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作决定、抓工作，把请示报告和担当作为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明确规定了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请示和报告的重大事项，总的来说，凡超出自身职权范围的事项必须请示报告，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的日常工作无须请示报告，但关乎全局、影响广泛的重要事情和重要情况应当请示报告。在实践中需要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事项具体把握，既考验政治意识、纪律观念，也考验政治能力、政治本领。对此，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善于立足党和国

（上接1版二条）
其次，导致社会思想意识日益复杂多变。在开放的互联网空间，不同的观念观念生成发酵，不同的思想思潮扩散碰撞，不同的文化文明交流交融，给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带来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活动独立性强了、选择性多了、差异性大了，这无疑为我们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同心同向带来挑战。
再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更加紧迫。现在的青少年大多摆脱了传统媒体的成长环境，成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互联网是青年一代重要的成长环境，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思想，可以说，这也是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的重大变数。

（二）

走得再远，我们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路边的风景再美，我们也不能迷乱初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必须落脚于做强做主流舆论，必须使主流媒体具有更加强大的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必须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如果媒体融合把主流阵地做小了，把主流声音做弱了，甚至削弱了舆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就完全背离了我们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初衷，就是南辕北辙、本末倒置。

媒体融合必须坚持导向为魂。我们强调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必须以坚持导向为魂为前提和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影响力，用好了造福国家和人民，用不好就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危害，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媒体融合的方向与路径，也启示我们，必须处理好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提高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技法”“算法”的能力，处理好“技以为用”和“为我所用”的关系，既善于运用又严控风险，做到趋利避害，确保安全。

媒体融合主流媒体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主流媒体特别是中央媒体是当仁不让的融合主体，要充分认识到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增强主人翁意识，进入主战场，打好主动仗。习近平总书记对主流媒体寄予厚望，要求主流媒体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求主流媒体要敢于引导、善于疏导，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点都不能含糊。我们要看到，与资本较充分的商业平台和纷纷擁攘的自媒体相比，主流媒体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公信力和权威性成为最核心的竞争力，要通过技术引领和内容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由主流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的步伐，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充分发挥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作用。

媒体融合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敢于和善于发扬斗争精神。要充分认识到面临的国内国际深刻背景和复杂环境，站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牢牢把握媒体融合的方向。媒体融合固然要高度重视信息革命成果的运用，但媒体融合绝不仅仅是融技术、融数据、融算法，而是融人、融思想、融阵地，要把“红色地带”越融越大，要让“灰色地带”在融合中尽快向“红色地带”转化，要大大压缩“黑色地带”。这样一场融合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要敢于和善于发扬斗争精神，不管技术如何发展，媒体如何变化，融合如何迅速，立场都不能动摇，方向都不能改变，原则都必须坚持。同时，主流媒体必须勇于刀刃向内，在体制机制上“动刀子”，破除藩篱，拆除壁垒，既做“增量改革”，更做“存量改革”，进一步激发创造力、释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现在还要加一条，用得好是真本事。为什么要加这一条？因为归根结底，媒体融合还是要用，要在实践当中检验效果。融

得好还要用得好，用不好，融的工作就会失去价值。如果没有用得好的本事，正能量就容易打折扣，管得住也可能变成管得死，所以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练就真本事上下更大功夫。主流价值影响力的版图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党的声音是否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是用得好与不好的重要检验标志。我们必须树立风险意识，坚决不让“用不好就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危害”的情况出现，及时传播准确、权威的信息，坚决不让虚假、歪曲的信息扰乱人心；发展壮大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坚决不让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肆意泛滥。

首先要明确谁来用。要回答好怎么用得好的问题，首先必须回答谁来用的问题。面对全球一张网，需要全国一盘棋。这盘棋局的主导权要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站在全局高度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各级宣传管理部门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

用得好就要上得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要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把主力军放在主战场，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在宣传思想舆论战线，多年来培养了一支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主力军，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主力军上主战场，上得去、站得牢，做强主流、占据主导、掌握主动，不断拓展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

用得好就要管得住。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原则，也是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证。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下，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不管媒体边界如何延展、延展到哪里，一切具备舆论功能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媒介和平台，都应坚持一个标准、一体管理，坚决不能“一手软一手硬”，坚决不能借融合之名“去政治化”，坚决不能借技术之名“去意识形态化”，使媒体融合陷入“技术主义”的泥沼。